

一部非同一般的学术回忆录

阿马蒂亚·森的《四海为家》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学术回忆录，记载了他所走过的一条非同寻常的学术道路。在经济学之外，此书尚有诸多宏富、重要而且充满妙趣的内容

刘建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21年7月，年近九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回忆录《四海为家》，由企鹅兰登书屋公司集团旗下的艾伦莱恩出版社隆重推出。同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王晗霞博士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该社业已买断《四海为家》一书的中文版权，问我是否愿意承担此书的翻译任务。我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再版我所翻译的阿马蒂亚·森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而与她结识，自然感激她的赏识和信任。

我很快收到王晗霞寄来的原著，于是通读全书，一边做笔记，一边给予评估。这部回忆录正文虽然长达400余页，但只写到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为止，时间跨度约为30年，时段的选择有点类似于《我的前半生》。这部巨著实际上相当于森的学术自传，从多个方面再现了他不断求学并取得巨大成功的青少年时代。一般的回忆录或自传，都会涉及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但作为一名世界性的大学者和大思想家，森的兴趣和着眼点却主要在于学术。在经济学之外，森一直对文化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他的一部关于印度历史和文化的论文集，而《四海为家》则保持了他对历史和文化问题的关注，只是选取的背景已经不限于印度，而是世界这一更为宏大的视域。一个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记忆清晰，思维敏捷，笔力雄健，能够圆满完成这样一部力作，令人感佩。虽然此书的翻译难度不下于《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但我还是决定承担这一译事。

森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并于1998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素有“经济学的良心”和“穷人的

经济学家”之誉。他出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印度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森也曾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发展顾问，帮助制定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框架和细节。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著作不胫而走，迄今为止已被译成40余种文字。他的学说和思想，他著述中体现的理性和人文精神，他经世济民的情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和评价。那么，他的学术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如何求学，如何治学？他在高手如林的世界学术殿堂里是如何取得出类拔萃的学术成就并赢得令人景仰的学术地位的？《四海为家》从不同侧面生动地追溯了他所走过的非凡道路，向沉潜学海之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因此，《四海为家》并不是一部生活回忆录，而是一部学术成长史，追溯了作者的成长环境、所受教育、思想发展、治学经历以及在学术界脱颖而出的内情。全书涉及的人物多达600余个，除亲人和历史人物外，主体是他在求学和治学的道路上遇到的诸多良师益友，涉及经济学学术思想史上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及流派。他们对森的学问养成起了大小不一的作用。学问之道，不仅在于自己独自琢磨，还在于与他人切磋。无论是在加尔各答学院街与同学的不断闲谈，还是在剑桥大学与师长在漫步时的倾心交流，都非常有益于他学术思路的开拓和学术思想的成熟。他的回忆录既有严肃的一面，也有轻松活泼的一面，穿插了他所遇之人的诸多佳话，读来不乏幽默雅趣。

森在这部回忆录中回顾了他一步步深入学术殿堂

的历程。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具有如此全球性影响的学术大家，一定是长期在象牙塔中皓首穷经之人。事实恰恰相反，森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人，而是一个善于处理学业与生活、工作与健康关系之人。

《四海为家》这部堪称巨制的回忆录由五编二十六章组成。每一章均可独立成篇。第一编至第三编，主要写作者在印度国内的学习生活。第四编和第五编主要写作者在英国的留学生活。

第一编由六章组成，基本反映了森的幼年经历与小学及中学生活。第一章“达卡与曼德勒”是森对自己幼年在缅甸生活的温馨回忆。他随父母旅居缅甸三年有余，那里的旖旎风光和淳朴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他最早的人生记忆。在他的印象中，曼德勒“是一个非常宜人的地方，满是引人注目的建筑、美丽的花园、迷人的街道、古老的王宫及护城河”。而“缅甸人似乎极为温和，总是在微笑，且非常可爱”。他在后来读到乔治·奥威尔的缅甸游记时还会心驰神往。对于曼德勒，他是有家的感觉的。那些早期经历，使森终生都对缅甸情有独钟。

第二章“孟加拉的河流”描述了作者幼年时所处的地理环境。河流是孟加拉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数条大河造就了它那广阔的冲积层三角洲，而今天孟加拉国的河水流出力居世界第三，仅次于亚马孙河水系和刚果河水系。森童年时醉心于在博多河（恒河下游）上乘船航行，欣赏孟加拉不断流变的景观。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读书时即已开始思考河流对其周边的经济与社会繁荣的重要意义。他在对孟加拉众多大小河流的描述中，倾注了对故乡的深情。

第三章“没有围墙的学校”描述了作者从八岁时起在泰戈尔创办的圣谛尼克坦学校读书的经历。泰戈尔注重教育增进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在他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学校特别有益于森的理念世界与理解能力的发展。森回忆说：“一个学校能够给予像圣谛尼克坦这样的乐趣，是我从来不曾想象到的。在决定做什么时有这么多自由，有这么多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同学可以交谈，有这么多和蔼可亲的老师可以接近并提出与课程无关的问题请益，而最重要的是，几乎没有需要强制遵循的纪律，也完全没有严厉的惩



2011年5月26日，意大利特兰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出席活动。

罚。”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里，户外教学的经历令他感到格外愉快，也赋予他专心致志的定力。他说：“就学习成绩而言，这所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并不是特别严格。我们往往没有任何考试，而在我们有考试时也基本不看重成绩。”课堂讨论则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极大地激活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森在圣谛尼克坦读书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外祖父母对他的关爱、陪伴及教诲。他的外祖父是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知名的哲学家，同时是森的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者。森“非常喜欢与外祖父以及外祖母交谈。所涉话题广泛，几乎无穷无尽，于是我们就长时间交谈下去”。他有任何问题，都总能得到外祖父耐心而细致的解答。外祖父的热情引导，使他较早接触到了深奥的印度哲学思想，使他养成了追求理性的素质。外祖父的梵文造诣也促成了森对学习梵文的浓烈兴趣。《四海为家》第四章“外祖父母的陪伴”说明，在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里学习之余，能够得到外祖父母在做人 and 做学问方面的熏陶，对于森的成长有多么重要。

第五章“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界”的主要篇幅则是对泰戈尔的回忆，再现了诗哲泰戈尔与圣雄甘地之间的数次争论，突出描述了泰戈尔对理性与自由的推重。

第六章“往日重现”表明，森在圣谛尼克坦读书十年，极为喜欢的课程是数学和梵文。他说：“我的重点主要是在古典梵语文学上。不过，在外祖父的帮

助下，我也能读一些吠陀梵语和史诗梵语。”他完全沉迷在梵文语言学这一学科里。但是，在最后两个学年里，他的学科志趣发生了变化，开始主攻科学，尤其是物理和数学，而且准备到著名的管区学院深造。

最初，森在醉心于梵语文学的同时，并不特别愿意学习英语，因而他的英语进步十分缓慢。他说：“就在我变得越来越投入梵文为我打开的世界时，数学的分析挑战也开始让我倾心。这一点在数学哲学领域尤其突出。”他对梵文和数学均极感兴趣。他表示：“我对抽象思维的迷醉和对周围世界浓厚的好奇心则把我拉入了另一个天地。”森在中学时遇到的专业方向选择问题，是几乎所有学生都会遇到的人生难题，而且倘若不能小心从事，非常容易铸成错误。最后，他没有选择心仪的梵文、数学或物理，而是选择了经济学。

《四海为家》第二编的第四章，主要描述了森在少年时期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它们对他的影响。他少年时目睹的孟加拉大饥荒，夺去了二三百万人的生命。这场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饥荒不仅让他思考人生和社会，也对他日后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饥荒成为他终生关注的一大研究课题。在随后的第八、九两章（“孟加拉与孟加拉国理念”“抵抗与分裂”）中，森追溯和探讨了孟加拉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发生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不幸暴力事件以及印度在独立的同时走向分治的历史进程。如今亲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并持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已经不多，因此森的这两章文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我认为，他对历史进程的真相灼见，对研究印度近现代史的学者会有启发意义。

孟加拉是英国殖民印度的桥头堡，而加尔各答曾是英属印度政府所在地，因此孟加拉复杂问题的形成和演变与英国人有重大干系，于是《四海为家》第十章“英国与印度”成为全书极其深刻的一章。此章原文曾摘要发表于英国《卫报》（2021年6月29日），题为《帝国的幻觉：阿马蒂亚·森论英国统治给印度造成的实际后果》。这是自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发表以来观察印度与英国历史关系最为深刻也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献。“二百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英国人在印度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未能完成

什么使命？”这是森与同学们在聊天时不断讨论的一个话题。森认为，英国“殖民统治的二百年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停滞时期，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没有提高一星半点”。他还断言：“他们的成就实在差得太远。”森对英帝国兴衰之道的理解，即使对于观察今日世界，也不无裨益。

在本书第三编中，森以五章的篇幅记述了自己在加尔各答管区学院的大学生活。在第十一章“加尔各答的风雅”中，他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加尔各答这座大城的独特历史和文化魅力。吉卜林称加尔各答为“可怕的黑夜一般的城市”。加尔各答曾以其贫困、凄惨和肮脏而声名狼藉，而一般的访客也大多只会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森的眼光与众不同，首先看到的是这里能够提供的优质教育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他十分喜欢并由衷赞赏加尔各答这座多元文化城市：“为什么不仅终老于斯的人酷爱着加尔各答，而且那些有可能深思并有机会另卜新居的人也眷恋着这座城市，并矢志不渝，决定继续留守于斯？这座城市的文化与知识的丰厚底蕴，肯定是人们酷爱它的原因之一。”

加尔各答学院街鳞次栉比的书店是森获取世界最新读物和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森于1951年入读管区学院，注册攻读经济学，兼修数学。该学院就毗邻学院街。他在第十二章“学院街”中记述了管区学院的前身印度教徒学院的历史沿革，也留下了对老师和同学的美好记忆。他非常看重这段只有两年之久的大学生活：“我在加尔各答的学业和新生活一帆风顺，我的一项理智的发现却影响了我后来大半生的工作路向。”在此期间，他接触了肯尼思·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

第十三章“如何理解马克思？”是这部回忆录中非常有趣也富于启示意义的一章。森在十余岁时就开始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他上大学时，马克思主义在加尔各答的学界影响很大。他追忆说：“在那个痴迷马克思的世界里，那是我们每天喝咖啡时必不可少的功课。”森认为：“马克思确实对选择自由的重要性了然于胸，也非常明白它对于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必要性。”森着迷于马克思的具有高度原创精神的“客观错觉”概念，以及他对与此相关的“虚假意识”的论述。森还认为：“充分关注马克

思关于人类行为的气度恢弘的学说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他的经济学思想的探讨，对于森的学术眼光和研究事业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然而，人生难以一帆风顺。森在十八岁时突然罹患口腔癌（鳞状细胞癌）。第十四章“一场早期的战斗”就回顾了那场严酷的生死考验的详情细节。他在发现自己生病后就利用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数本有关癌症的普及性图书，在两个医生轻率否定他得了恶性肿瘤的情况下自己先行准确诊断出此病性质来。在他的病症得到活检的证实后，家里陷入悲怆之中。他回忆道：“在我下课回来后，家里已是一片衰戚的气氛。母亲显然在哭泣（尽管她在竭力掩饰这一点）；父亲化身为一尊忧郁的雕像；妹妹曼珠看起来一脸愁云惨雾；奇尼叔叔坐在那里，面色非常阴沉。”森本人虽然深感沮丧，但还算泰然自若。在治疗期间，他一面承受着放疗的酷烈痛苦，一面期待着重返学院街，继续与同学悠然闲谈及激烈争论政治问题。森在诊断和治疗癌症时发挥自主性，体现了一种高度的人生智慧。他战胜癌症的经历或许值得类似患者借鉴。

森在管区学院读本科两年后，决定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追随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皮耶罗·斯拉法以及丹尼斯·罗伯逊攻读经济学。他认为：“莫里斯·多布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具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皮耶罗·斯拉法则是在经济学和哲学领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一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密友和同道。除他们二人外，还得加上丹尼斯·罗伯逊的名字，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做出了极富原创性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预见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关的想法。”第十五章“前往英格兰”就记述了他如何选择留学目标学校并如愿以偿的经历。他由此步入人生和事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

《四海为家》第四编共有九章，集中讲述了作者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程，披露了他的学术视野是如何逐渐变宽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和具有个性的经济学理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显然，此编是全书重心之所在。

森于1953年9月抵达剑桥。著名经济学家皮耶

罗·斯拉法教授成为他的学业导师，而肯尼思·贝里尔研究员则成为直接为他负责的督学导师。后者是一位非常聪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史学家。到了剑桥的第二学年，莫里斯·多布成为森的主要导师。他们既是诲人不倦的良师，也很快就成为他亲密无间的益友。

剑桥是一个经济学家们不断提出新理论新学说的地方。不错，三一学院的老师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每个人都具有批判精神和原创精神，也愿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启迪后学。异说纷呈，相互争锋，是这里的一个常见学术现象。自然，未必所有新理论新学说都是正确的。因此，斯拉法鼓励森发扬独立思考精神，至少应对剑桥经济学中的某些说法持怀疑态度。除批判性思维方法外，森还从斯拉法身上学到了一些关于自我审查和自我批评的品质，不纠缠于他人是非的细枝末节，因而从一开始就得以站在了学术的高起点上，让自己很快形成大的研究格局。

从1953年至1963年，森经十年寒窗苦读，顺利在剑桥完成了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业，随后做了一名奖学金研究员，而最终则成为一名讲师及管理人员。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即已雷厉风行，提前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撰写任务。森在四十五年之后重归剑桥，成为该院新任院长。他在本书第十六章“三一学院之门”中记述了他在剑桥的留学生涯与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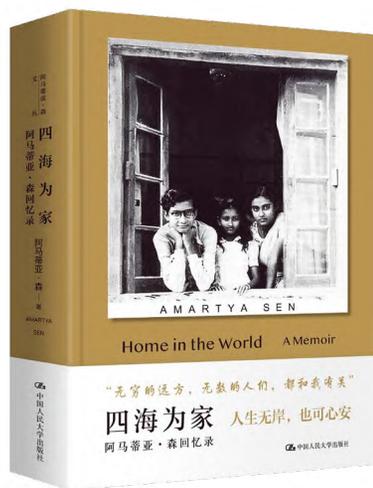
独自苦读虽然会收专心致志之效，但不一定有利于大学问家的产生。森无论在印度就学还是在英国读书，都十分热衷于与其他学人交际。他在剑桥就结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除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外，还与哲学、数学、历史学等专业的不少学生成为朋友。森也结识了很多来自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学人，常在晚间与他们在校园里聚会。森在与他们的交流和切磋中，不断增益自己的学识和见闻。森的诸多学友均非寻常之辈。他们思维活跃，无一不是只知闭门读书之人，因而在日后各自的人生中，全都事业有成，成为知名学者或政要。森与来自巴基斯坦的马赫布卜·哈克、来自斯里兰卡的拉尔·贾亚瓦德纳、来自以色列的迈克尔·布鲁诺等，结成了让他受益终生的友谊。

除与学人交往外，森也与阿登布鲁克医院放疗中心的戴维·布拉瑟顿等医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

们精心周到的监护下，他在剑桥十年的生活中避免了癌症的复发。他说：“我与放疗中心的关系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联系之一。”森与布拉瑟顿医生的私谊发展到了情深意厚的程度。他曾多次去布拉瑟顿家拜访，也一直没有忘怀他们之间的感人友谊。他回忆道：“多年后，在他的妻子离世后，他独自住在格兰切斯特草甸的大宅中，我与他曾在那儿度过一个迷人的夜晚。当时，他为我演奏了优美的钢琴曲。琴声美妙动听，但其中却夹杂着太多凄婉的音符，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也令我感到悲伤。”他还写道：“布拉瑟顿医生不仅一直跟踪我的医疗问题，

甚至在我于1963年离开剑桥之后依然如此，而且他还以极大的个人兴趣，关注我的职业和学术生涯。让人伤感的是，他在1997年去世了，而那正是我从哈佛回到剑桥的前一年，因此，我想在院长官邸招待他的计划也就永远无法实现了。我想他一定会乐于看到，昔日他精心照护的生命岌岌可危的男生，如今终究在过着圆满的生活。”森满怀深情，在《四海为家》第十七章“朋友与圈”中记述了他与众多友人的动人情谊。

第十八章“什么经济学？”是第四编中很重要的一章，揭示了剑桥这个学术重镇鲜为人知的一些侧面。由于不同学派的存在，剑桥经济学界并非总是风平浪静，而是不时波澜起伏。例如，一些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追随者）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因学术思想分歧尖锐而相互对立，争论不休。琼·罗宾逊教授也是森的一个导师。她坚决否认“主流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对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斯拉法和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学术思想持批评或排斥态度。森与她的私谊虽然不错，但他没有苟同她对增长经济学和资本理论的论述，因此两人之间并没有形成一条学术传承链。森回忆道：“如果理查德·卡恩是这些新凯恩斯主义



《四海为家》
阿马蒂亚·森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07月

者中最好争辩的，那么琼·罗宾逊则是最能说会道且最直言不讳的，而尼古拉斯·卡尔多因对资本理论令人信服的表述使其与凯恩斯的思想更为一致，是他们当中最具原创性和创造力的经济学家。”不过，根据森的说法，三一学院倒是剑桥经济学界论战中的“一片绿洲，三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似乎彼此都能和睦相处，而且还经常互动”。他不无遗憾地发现，剑桥经济学非常注重对经济总量、资本的总价值一类主题的研究，却对诸如不平等、贫困和剥削等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关注甚少。森认为，在这些问题上，琼·罗宾逊采取

的立场是，就优先事项而言，人们首先要关注的只是最大化经济增长，而人们一旦在经济上增长了，变富有了，就能够转而关注医疗服务、教育和别的所有诸如此类的事项。森断言：“这种方法是发展思维中更加严重的错误之一。”琼·罗宾逊想让森与她一道研究资本理论。他说：“尽管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一心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教育、医疗服务和营养的发展，不仅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害，而且是一种适得其反的战略。”作为一名学生，森保持了独立的学术立场和理论追求，没有屈从于他不认同的前辈学者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者多布是当时剑桥为数不多的对福利经济学感兴趣的经济学讲师之一。森在到达剑桥后不久，就认识到右翼的鲍尔不仅是发展经济学方面最好的教师，而且还是剑桥大学在这个学科上最有成就的思想家，以绝对的优势领先于他人。在剑桥大学新的学术环境下，在熟悉许多不同经济学学派的成果之后，森对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兴趣，包括对社会发展程度予以评估的兴趣，仍然十分强烈。他回忆道：“我越来越清楚，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森无法说服任何一位剑桥教师对社会选择理论产生兴趣，而琼·罗宾逊教授则坚决反对他从事此项

研究。只有皮耶罗·斯拉法对森试图涉足社会选择理论表示支持，对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提出了中肯的指导意见。

《四海为家》第十九章“欧洲知何处？”记述了森在学生时代的数次欧洲之行以及他对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的观察和思考。他在紧张学习的间隙常利用一切机会游历欧洲大陆。还在印度读书时，他就被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所深深吸引，开始迷恋上意大利。他在留学期间先后造访了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挪威、瑞典、丹麦、波兰等国家。他初时经济拮据，却对仅靠面包、乳酪、咖啡、搭便车和青年旅舍维持生存深感欣慰。他在观看历史遗迹之外，热望了解社会与民俗，尽

可能广交朋友，尽可能深入认识欧洲，并通过反思历史来展望欧洲的未来。由于熟悉了欧洲旅游业，他甚至萌生了一个想法：“倘若我经济学一事无成，也许我可以经营一家旅游公司。”从这一章不难看到，行万里路对森的学术视野的拓宽是极有裨益的。

森在本书第二十章“交谈与政治”中主要回忆了剑桥大学的学人社团。他先后积极参加过多个社团，而他对学术和政治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回忆说：“我喜欢参加政治辩论和研讨会，而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成为举办那些会议的俱乐部的一员，从而可以免费出席。我于是分别成为自由党俱乐部和保守党俱乐部的会员，并且喜欢在有时感觉像是异邦人聚会的场合开展的讨论。”他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剑桥最著名的讨论小组“使徒社”也就是所谓剑桥座谈会的历史与活动。他写道：“该社会员包括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作家、历史学家以及在知识和创新领域取得其他非凡成就的人士。例如，在哲学领域，就包括亨利·西奇威克、伯特兰·罗素、乔治·爱德华·穆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弗兰克·拉姆齐和理查德·布雷思韦特在内的哲学家。使



徒社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威廉·科里关于它是‘剑桥的知识贵族小团体’这一描述。”这些社团的定期讨论会不仅让森信息灵通，胸襟开阔，而且使他思维活跃，语言犀利，善于演讲。

森的本科时代在1955年6月圆满结束。他先后历时四年在加尔各答和剑桥完成经济学本科学业。他于是接着在剑桥攻读研究生。其间，他开始在很有学术分量和影响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他不无自豪地回忆说：“研究生第一学年结束之时，我开始思量，将这些论文融合在一起，我是否可以弄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来。”他于是将这些论文送呈自己的老师莫里斯·多布，请他提出评估意见。结果，莫里斯·多布给他的论文批注了巨量有助益的意见。森回忆说：“他还给我做出了令人欣慰的结论，就是在我的这些篇什里，无疑蕴含着多于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所需的东西。”可是，学院规定，学生必须在完成三年研究之后方可提交博士学位论文。因此，森请求系里允许他把剩余的两年研究时间用于加尔各答，以使他能够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印度的实证数据。此时，森接到加尔各答一所新大学贾达夫普尔大学的邀请，

1943年12月，“二战”期间，孟加拉一皇家空军基地，英国皇家空军士兵为当地儿童发放食物。森在少年时目睹的孟加拉大饥荒，夺去了二三十万人的生命。饥荒成为他终生关注的一大研究课题。

委托他以自己所认定的恰当方式来创建经济系并安排其课程。森在读研初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可谓神速。由于不必再为他的博士课题煞费苦心,他就想利用这个时机学习哲学,在一些权威的哲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他最终按时提交论文,轻取博士学位。他在《四海为家》第二十一章“在剑桥与加尔各答之间”中对自己这段经历的回忆,应该说对所有矢志读博的人都会有一定参考意义。

随后,森成为三一学院的讲师,得以与自己往日的老师合作。作为一名年轻的讲师,森为能与莫里斯·多布和皮耶罗·斯拉法、丹尼斯·罗伯逊等名师合作,一道在三一学院执教,而感到极为振奋,这段日子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在本书第二十二章“多布、斯拉法与罗伯逊”一章中,集中描绘了那些大师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罗伯逊总是十分友好而且乐于交谈。罗伯逊在研究工作中探索的一些概念,“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探讨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罗伯逊与凯恩斯“不仅都在研究类似的问题和探索类似的经济联系,而且一直相互交流思想”。因此,森认为罗伯逊是有真才实学的,只是没有获得如凯恩斯那样的崇高声誉。

森在加尔各答管区学院开始攻读经济学时,多布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深为多布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而倾倒。他回忆说:“我从早期阅读多布的著述中悟出十分关键的一点,就是经过严密审视的描述性经济学的重要性。”他初入剑桥即定期去拜访多布,与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而在剑桥读本科的第二年则正式成为多布的学生。多布对经济学的真知灼见让森有醍醐灌顶之感,而多布异乎寻常的友善和对学生不遗余力的帮助也让森非常感佩。

斯拉法是森在三一学院本科期间的学业主管。斯拉法欣赏森的才具,森着迷于斯拉法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师生二人如鱼得水,相得益彰。森回忆说:“斯拉法喜欢聊天,而且话题包罗万象……在1958—1963年期间,我们几乎每天午饭后都会长距离散步……斯拉法除了对经济学和哲学做出巨大贡献之外,还与莫里斯·多布一道,对大卫·李嘉图全集终极版的编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森在本书第

二十二章“多布、斯拉法与罗伯逊”中,不仅深情地缅怀了恩师斯拉法,而且记载了斯拉法与维特根斯坦、葛兰西等知名学者交往的趣闻逸事。他指出,他们之间既有关系默契之时,也有意见相左之日。这种师生关系,让森获益匪浅。森在成为那些老师的同事后,开始真正了解并熟知他们,于是才得以栩栩如生地把他们的人生和事业、思想和性格再现出来。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1960—1961),森在国际教育界和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名声鹊起。他在本书第二十三章“邂逅相逢于美国”中回顾了自己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执教的愉快经历。他为自己能够远离剑桥新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之间的争斗而欣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担任了为期一年的客座助理教授,幸运地遇到了他极为想望的两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他发现,两位大师都十分平易近人。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这个经济学重镇,森通过断断续续的交谈,从索洛引人入胜的风雅谈吐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森还发现,与剑桥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们迥然不同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不同流派之间却几乎完全没有宗派主义。森不无自豪地回忆说:“麻省理工学院有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但大家有一种共识,即保罗·萨缪尔森为该校的指路明灯。实际上,他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并且对这个学科的几乎每一领域都撰写了具有决定性的权威论著。我最初是在加尔各答基督教青年会招待所的宿舍里开始阅读他的著作的,而如今我发现自己能够去上他的课了,既学习他的经济学,又学习他的推理和阐释风格。”森认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时进展神速,效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此时,他的经济学造诣和学术境界,可谓已经登堂入室。

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期间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一封信,邀请他在夏季学期讲授发展经济学这门课程。此时,他对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且知道这一领域的先驱肯尼思·阿罗教授就在斯坦福大学,所以他油然萌生了借此机会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想法。后来,他与美国学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在1964—1965年期间,森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客座教授,随后在1968—1969年期

间出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得以与肯尼思·阿罗和约翰·罗尔斯等诸多良师益友日夕相伴。在美国诸多名校任教和访学期间，他的社会选择理论研究工作呈现突飞猛进之势。

一个学者，如果不能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就可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敢越雷池一步，则势必难以取得突破和创新。森在第二十四章“剑桥再回首”中讲述自己在剑桥不断进取，最终获准讲授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往事。他回忆道：“教授会建制派强烈阻止我讲授福利经济学这门课程……由于在剑桥履行教学和研究职责后我手头仍有时间，几经踌躇之后，我决定还是探索社会选择理论。”敢于挑战权威，绝不迎合名家，或许是他能在日后获得突出科研成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四海为家》第五编只有两章。森在第二十五章“劝说与合作”中追忆了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观察。在英国留学和在欧洲大陆旅行时，他就热切关注和思考这一历史进程。他认为：“欧洲迫切需要统一的直接原因，不是出于对贸易和商业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一体化的银行和货币安排的考虑（这些都将在后来出现），而是为了欧洲和平而必须实现政治统一。”劝说对欧洲合作起了重大作用。森发现，凯恩斯强调劝说在改变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他欣慰地看到：“在过去的八十年间，欧洲在法治、人权、参与性民主、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

1963年6月，森与妻子纳巴尼塔收拾行装前往德里，应邀开始在德里经济学院的教学工作。行文至此，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传播甚广的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总觉得，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自工作以来，阿马蒂亚·森一生都在以行动诠释鲁迅的这个富于哲理的论断。森一生结交良师益友无数，使自己的学术事业得到了很大助力；他也始终关注着世界上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寄寓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他在本书第二十六章中回忆说：“在拓展我的人际交往范围方面，我必须大力称赏剑桥。我在大学内外的生活中与许多人邂逅，这给予我大量机会，让我得以遇到那些本来永远不会认识的人。”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吸引我们进入那些生活在远方的人的势力范围的事业，可能会有某种极

富建设性的东西。尽管全球化因被指控造成不少问题而遭到很多责难，但如果我们将对外关系的拓展视为有价值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积极地看待全球化。在有些人看来，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网络的扩展似乎是破坏性势力，但除了对普遍生活水准造成的影响之外，这种全球性发展还使我们与他人发生联系，而如果缺乏让我们进入陌生地域的活动，那么我们可能实际上就永远不会了解他们，从而有可能对他们的存在始终一无所知。了解他人，对我们如何思考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道德世界，都可能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各种各样的交往和互动，世界上无数的人可以从疏远变得亲近，从而使人类文明得以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苏轼有词句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豁达之人而言，为了学业和工作，可以做到处处无家处处家。森在九十余载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以四海为家。无论是幼年时在缅甸的曼德勒、今孟加拉国的达卡，青少年时在印度的圣蒂尼克坦及加尔各答，还是成年后负笈剑桥，抑或是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执教，他都有家的感觉。四海为家，其实就是一种格局，一种视域，一种境界。森实际上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一名世界公民，一种包容性世界文明的倡导者。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整个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问题也好，文化问题也好，都得从全球角度观照和考虑，我们也才能跨越时空，拓宽视野，更好地活跃于世界舞台。

总之，阿马蒂亚·森的《四海为家》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学术回忆录，记载了他所走过的一条非同寻常的学术道路。在经济学之外，此书尚有诸多宏富、重要而且充满妙趣的内容。全书在展示一个学术大家是如何走向成功的同时，也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以及他对许多重要的学术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洞见，是一部难得的颇具深度的现代学术见闻录，回答了如何选择专业、如何治学、如何观察世界、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等重大问题，对于有志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学子和学者，应当富于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文为《四海一家：阿马蒂亚·森回忆录》“中译本序”，有删节。标题为财新编辑所拟。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